



历史的回声

格尔夏回忆录

王永庆 整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历史的回声

——格尔夏回忆录

王永庆 整理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王永庆整理.

—五家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2008. 8

ISBN 978 - 7 - 80756 - 067 - 8

I. 历… II. 王… III. 格尔夏—回忆录

IV. 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0271 号

历史的回声——格尔夏回忆录

出版发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版社

地 址：新疆五家渠市迎宾路 619 号

邮 编：831300

电 话：0994 - 5825298 5825226 5825228

传 真：0994 - 5822600

印 刷：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1 ~ 3000 册

书 号：ISBN 978 - 7 - 80756 - 067 - 8

定 价：28.00 元

自序

我原名叫格尔夏巴尼，三区革命时期叫格尔夏巴尼·阿拉西诺夫，解放后改为格尔夏。1920年，出生在新疆乌苏县一个蒙古族雇农家庭。1945年，参加了新疆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革命。1950年入党，曾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书记、中共“八大”正式代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正厅级）、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文化大革命”后，任石河子农学院副院长、院长。1983年10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同时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第五、第六届委员。1994年，正式离休。2002年起，是自治区第九、第十届政协委员，同时是自治区和兵团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

作为一个从事了半个多世纪革命活动的少数民族离休干部，本应该将自己的经历写下来留给后人，可我已是步入晚霞的老人，再加上语言文字上的局限性，所以并没有想过要写回忆录。但是，最近几年发生的几件对我影响较大的事，使我逐渐有了写回忆录的信心。

大约在1985年，兵团《绿洲》杂志编辑部一位同志采访我，我把自己在三区革命时期孤身入虎穴，智取喇嘛庙的故事给他谈了。他们整理后在《绿洲》杂志上发表了。后来自治区《新疆党史》杂志和其他一些地方报刊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2001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自治区党史研究室来了几位同志，带着照相机、录音机来到我家，让我谈一下参加党的“八大”的情况。我很高兴地把自已1950年参加了第一届国庆节新疆少数民族观礼代表团到北京见到毛主席；1956年参加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同年被选为“八大”的正式代表参加了“八大”会议；1958年参加中央高

级党校学习；1962年参加“七千人大会”；多次见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且数次聆听毛主席重要讲话的情况都给他们谈了。不久，中央电视台、新疆电视台，以及其他报刊将这次访谈录播出和发表了。

2002年，我写的《纪念王恩茂同志逝世一周年》一文，被自治区《新疆党史》杂志刊用。

2004年，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又向我要1950年底写的《血泪树》文章底稿，我建议他们去找当时的《新疆日报》。他们找到后又重新将文章发表在《新疆党史》杂志上。同时，根据自治区党史研究室的要求，我又写了题为《一波三折的新疆少数民族文字的改革》的文章，全文发表在《新疆党史》杂志上。

赛福鼎同志逝世后，中央党史研究室来了两位同志约我写一篇纪念赛福鼎的文章……

就这样不断有人前来约稿，不断有新的文章问世。特别令人激动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来电话告诉我：“你以前写的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在‘八大’会议上致词那一段很好，请你再回忆一下其他兄弟党代表致词的情况。”他们还要了我的简历以及询问了离休后的情况，这是对我最大的关怀和鼓舞。

一些老领导、老战友也热情地鼓励我。正是这些鼓励与支持给了我信心和勇气，我决心不辜负党和同志们的期望，决定把自己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活动中那些印象最深刻、最突出、最难忘的经历和感受，现在能记得的不加分析、不加感想体会、不加对人对事的评论、客观如实地写下来，留给后人评论，给中共党史研究工作做一些参考。

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我的老同事、老战友于旭同志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最终通过王永庆同志的辛勤工作和精心编辑，终于完成了这部回忆录。在此我向帮助过我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格尔夏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目 录

第一章 求学之路

1. 悲惨的童年	1
2. 绝处逢生	3
3. 进入军校	5
4. 政局突变	6

第二章 投身三区革命

1. 护粮路上越国境	9
2. 三区革命的起因	10
3. 成立临时政府	12
4. 回国参加游击队	13
5. 攻克乌苏	14
6. 制止滥杀无辜	15
7. 保护三名汉族妇女	17
8. 停战和平谈判	21
9. 悲惨的难民	23
10. 新疆和平民主同盟会	24
11. 帮助幸存的汉族妇女成家	25
12. 孤身入虎穴	27

13. 组建三区人民革命党	32
14. 智取喇嘛庙	34
15. 平易近人的阿合买提江	42
16. 苏联顾问撤走后的反复	45
17. 迎接新疆和平解放	45

第三章 经受考验

1. 初识人民解放军	50
2. 光荣入党	52
3. 朴素的王震将军	56
4. 参加第一届国庆节观礼代表团见到毛主席	57
5. 国宴风波	60
6. 参加国庆大典	61
7. 动情的康巴尔汗	63
8. 幸福的维吾尔老大妈	65
9. 关于三区减租反霸的分歧	65
10. 《血泪树》引起的强烈反响	67
11. 批判“五十一人座谈会”	75
12. “巴图尔”艾尼事件	80
13. 集中部分三区干部进行“三反”运动	84
14. 中共新疆分局第二届党代会	88
15. 关键时刻伸援手	94
16. 参加民族区域自治试点团	97

第四章 茁壮成长

1. 参加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101
2. 当选“八大”正式代表	103

3. 难忘的婚礼	107
4. 在中央高级党校的“交心”活动	109
5. 关于“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的争论	112
6. 参加徐水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典礼	115
7. “我是硬骨头的中国人”	118
8. 左右为难的杨献珍	121
9. 参加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	122
10. 平生第一次作检查	130

第五章 新疆民族文字改革

1. 新疆民族文字改革的渊源	132
2. 成立新疆民族语言文字研究会	132
3. 排除干扰,坚持进行民族语言文字改革	136
4. 因循守旧,文字改革工作的成果被否定	140

第六章 “文革”岁月

1. 政治气候骤变	146
2. 参加接待室工作	151
3. 有头无尾的自治区党委三千会	153
4. 回家当了逍遥派	156
5. 栽赃陷害的牺牲品	158
6. 残酷斗争遭凌辱	163
7. 干校生涯	165

第七章 走进兵团

1. 难忘的一三三团	168
------------------	-----

2. 怀念张仲瀚同志	177
3. 拨乱反正后的石河子农学院	181
4. 走向辉煌的石河子大学	188
5. 终身献兵团	189
6. 历史的回声	191
7. 最后的回顾	192

附 录

1. 血泪树	195
2. 孤身入虎穴	199
后 记	212

第一章 求学之路

1. 悲惨的童年

1920年10月27日，我降生在新疆乌苏县蒙古百斯王管辖的三苏木的伊克苏木赛日乡。父亲名叫察哈尔阿拉西，蒙语中察哈尔就是仆人的意思。父亲一年到头给地主、头人扛长工，家里穷得没有一亩土地，不要说牛、羊了，连一只鸡也没有。

我和父母、哥哥、姐姐，一家七口人，挤住在一顶破烂不堪的小毡房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冬天，寒风刺骨，我们只能用麦草将毡房包起来，在毡房中间烧柴禾取暖做饭。

家里穷得叮当响，唯一的一口铁锅裂了一条缝，每次做饭前，得先把裂缝糊上，锅才能不漏水。支铁锅用的铁架子断了一条腿，只能用一块石头支着，一家人到锅跟前都要小心翼翼，生怕碰翻了锅而烫着人。全家七口人只有两个木碗、一个石头碗。吃饭时，要到舅舅家去借碗，借不上就得轮流着谁先吃、谁后吃。

姐姐最吃亏，因为按蒙古族的习惯，女人不能和男人一起吃饭，更不能多吃。等到男人们都吃完了，有剩饭时姐姐才可以吃上些，没剩饭了就得挨饿。

离我家不远有十几棵杨树（察汉乌拉松）长在一堆，传说这树下有神（鲁苏图）。每年父母亲要带着哥哥、姐姐到那里磕头朝拜，往树上绑布条，祈求神灵保佑我们以后可以交好运，可是好运到底在哪里？这种穷日

子到底哪年是个头？

蒙古族部落头人名叫邓金阿拉西，人称百斯王，他管辖着部落（三苏木）中的五六百户人家，这些人家都在南天山一带过着游牧生活。

百斯王的驻地在将金沟（将金郭棱）王爷府，临近有喇嘛庙（现乌苏林场），百斯王下面有千户长（古孜达）、副千户长（买人扎郎）、百户长（藏根）、五十户长（孔德）、十户长（达尔格）等。这些大小头人全家的生活花销，全部都由老百姓缴纳的户税来负担。

我家住在赛日乡农村，离王爷府六七十公里，这里的几十户人家，除了有几家种着几亩地、养了几头牲畜外，都是祖祖辈辈没吃没穿的穷人，过着当牛做马的悲惨生活。

1923年的秋天，我刚满三岁，就被拉到王爷府去做了替死娃（倒郎娃）。一天，百户长胡九，带领几个仆人，来到村子挨家收缴户税。有钱的人家交钱或牲畜，没钱的人家就抽一个劳力，到百斯王或其他大小头人的家去干活抵债。那天，父亲出去扛长工，哥哥躲起来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我。

胡九恶狠狠地对母亲说：“你们家一没钱，二又没人，就把这小孩拿去给王爷的女儿当侍奴，陪她一块儿玩。”我母亲哪里知道这是拉我去当替死娃呀！就这样，我被他们硬拉到六七十公里远的王爷府去了。

王爷府的前面有一条叫将金沟（将金郭棱）的河，它向北延伸，河床里长着许多百年老胡杨。离王爷府一公里的喇嘛庙，有五六十户喇嘛。王爷府和喇嘛庙中间住着几十户察哈尔（仆人），专门为百斯王和喇嘛庙干活，侍候百斯王。

王爷府的院子很大，有几十间用土坯盖起的房子，雕花的门窗、廊柱，很是气派。院子前面搭了两顶蒙古包，一座崭新的很漂亮，一座破破烂烂的又臭又脏。藏根把我带到王爷府，交给了艾吉（王爷女儿的奶妈）。艾吉把我领去见了王爷和夫人，然后就把我送进院外那顶破毡房。房子中间躺着王爷的女儿，她可能是患了天花，已经病得昏迷不醒，奄奄一息。

房里几个正在念经的喇嘛，见我进来，连忙站起来说：“赶快换衣服，开始倒郎（替死）。”

艾吉把我的破衣服脱下来给女孩子换上，又把女孩脱下来的绸缎衣服穿在我身上，然后把女孩抬到另一座新蒙古包去，叫我躺在她床上做了替死娃，再替换名字。就这样，姑娘的名字格尔夏巴尼成了我的名字，我的名字乌玛成了姑娘的名字。从此，我的名字就成了格尔夏巴尼（一种西藏水果的名字）。

喇嘛们不断地念着经，往我身上撒着盐巴和大米。年幼的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有大哭大叫，死命挣扎，最后哭嚎得没劲了，睡着了。天快亮时，喇嘛们把我用毡子裹起来，驮在马背上，扔到将金沟（将金郭棱）森林里的一棵大梧桐树下。原来，他们是要把我这个替死娃送给鬼或野兽吃掉，好让王爷女儿活下来。

漆黑的将金沟既恐怖又阴森，凄厉的秋风把金黄的树叶刮得沙沙作响，一棵棵奇形怪状的梧桐树，像一个个饥饿的怪兽，张着血盆大口，要把我吞到肚里去。不知害怕的我，半夜被冷风给吹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山沟里，周围一个亲人也没有，只有拼命地哭喊。

天亮了，一位捡柴禾的女人听到了我的哭声，来到我跟前，发现我是一个男孩。赶快跑回去告诉她父亲杜格林库克。这位平日专门陪王爷下棋的老汉，把已经哭哑了嗓子浑身瘫软的我抱回了家，禀告了王爷。

百斯王无可奈何地说：“本来是要他当替死娃，换回我女儿的命，可鬼还是要了我女儿的命，没有要他的命（他女儿快天亮时已经死去），那就让他活下去吧，就在我家当个小喇嘛算了。”

从此，我这个替死娃就变成了小喇嘛，整天跟着老喇嘛学藏文和蒙文。

当喇嘛的日子虽然辛苦，但我却有了学习文化的机会，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2. 绝处逢生

过了六七年，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脖子肿得老大。因没钱治疗，病得越来越厉害，拖了一年多，脖子上的疮溃烂了，满脖子往外流脓，惹的

绿头苍蝇围在身边乱飞，又疼、又脏。王爷见我没什么用了，这才叫人把我送回家。

父母家人六七年没见到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呢。现在见我奄奄一息的样子，吓了一跳。妈妈哭着求哥哥赶快把我领到乌苏县城看病。但是，家里穷得连锅也揭不开，哪有钱治病呢？只好走一步看一步，到县城去碰碰运气。

哥哥背着我来乌苏县城，把我放在路边，跪在地上乞求人们发发慈悲，救救我这个苦命的孩子。

这时，一位苏联妇女走过来关心地问：“你们是哪里的？”

哥哥赶快回答说：“我们是赛日乡农村的。”

她指着我问哥哥：“他是你什么人？为什么不赶快给他看病？”

哥哥回答说：“他是我弟弟，因为家里穷，没钱给他看病。求你救救他吧。”

这位苏联妇女看了看我的疮口，就让哥哥把我领到她们的医务所，她仔细地给我擦干净脖子上的脓水，然后上了药。那药煞得我钻心的疼，我想，只要能治好我的病，再疼我也要坚持住。就这样，这位好心的苏联医生接连给我换了几次药，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原来，20世纪30年代初，盛世才^①被推举为新疆边防督办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并不信任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摆脱困境，他决定倒向苏联一边。苏联从本国的利益出发，也希望新疆有一个亲苏的地方政府，便与盛世才结盟，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给盛世才以很大的帮助。给新疆派来的医疗队来到乌苏，免费给穷人治病。也是我命不该绝，竟然碰上了这样的好事，是这位苏联老大姐把我从死神的手里夺了回来，真得好好感激他们呀！

^① 盛世才（1897～1970年）：辽宁省开源县人，汉族。1930年秋来新疆。1933年在新疆“4·12”政变中上台，出任新疆省边防督办，独揽新疆军政大权，实施军阀独裁统治。曾一度执行亲苏联共政策。1942年公开投靠蒋介石。1944年调离新疆。新中国成立前夕逃亡台湾。1970年在台湾病故。（《新疆三区革命大事记》，新疆人民出版社，第1页）

病好以后，我到乌苏县四棵树小学念书。这个学校的校长和教师都是从苏联来的。因为我从3岁起就已经学过藏文、蒙文，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加上自己的刻苦努力，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

毕业后，好心的学校领导和老师，又推荐我参加了位于迪化市的专修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族文字的简易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结果，全县只录取两人，我是其中一个，那年我15岁。

3. 进入军校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了，盛世才在苏联的推动下，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新政府重视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

1937年10月，周小舟奉命以中央军委联络员的身份来到新疆，经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市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为了在广大民众中播撒革命火种，在苏联援助下建立了新疆陆军军官学院。

17岁时，我从师范学校被录取到新疆陆军军官学院政治理论系（预科一年）学习，这是我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我在青年时代的迷茫和朦胧中，开始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理论。

这是一所全新的按照苏联管理模式管理的正规军事学校，其教学计划、教材选择、课程安排、军事操典、管理制度，完全照搬于苏联军校。同时，教官、职员也大部分是从苏联红军中派来的。学员们都穿着苏式呢子军服、佩带肩章、还配有大衣、皮靴，甚至连整个吃住等生活待遇，都和苏联军校相同。每个月，学校还从当地领取三十斤白面，发给学员的家庭。这不但使我，而且使我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学校管理严格，纪律严明，我们过的完全是军营式的生活，不能随意离校外出，违反纪律要受到纪律处分。上课开始配有翻译，经过一年的预科学习，我们基本上学会了汉语和俄语。通过学习，我们知道了苏联的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知道了列宁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红军。更重要的是，知道了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先锋队——八路军。

八路军办事处的领导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任锡英等，经常到军

校来讲课，教我们唱《太行山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延安颂》等抗日进步歌曲。这些雄壮有力、琅琅上口的革命歌曲，不但非常好听，而且激发了我们报效祖国的热情。从此，我懂得了中国共产党是为天下工农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先锋队，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为了挽救处于危难中的中国，他们不怕牺牲，英勇善战，前赴后继，万众一心，坚决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学校里流传着各种登载抗日战争消息和进步内容的报刊、书籍，上面印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画像和照片。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刊和讲课中的介绍，使我认识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伟人，是八路军的统帅，设在新疆的八路军办事处，是为新疆各民族兄弟办好事的。我对初次接触的这些革命道理，感觉是那样的新鲜和亲切，这些革命理论像普照万物的太阳，照亮了我那颗幼稚的心灵，使我明白了穷人为什么世代代受欺压的道理。我想，为了我家以及天下的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4. 政局突变

就在我充满着对和平与进步无限向往的时候，学校里的政治气氛突然发生了令我意想不到的转变。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向苏联发动了进攻，苏德战争就此爆发。此时，苏联为了对付德国法西斯的凶猛进攻，已经不能继续给盛世才援助。

这一变化，使盛世才感到与苏联的结盟无利可图。之前，蒋介石刚制造了“皖南事变”，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惯于见风使舵的盛世才认为苏联已经靠不住了，中共也自顾不暇，因此，只有投靠蒋介石，才能确保他在新疆的统治地位。

正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在竭力拉拢盛世才。多次派人来谈判，并决定派国民党部队进入新疆，加强稳定和防备。

1943年8月29日，宋美龄代表蒋介石飞临迪化，委任盛世才为国民

党中央监察委员、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和第八战区副司令官，并对盛世才作了四点指示：

- 一、调派甘肃境内政府军由兰州进驻安西、玉门，牵制哈密苏军；
- 二、委派新疆外交特派员，将外交权收归中央；
- 三、肃清新疆的共产党；
- 四、要苏军退出新疆。

至此，盛世才抛弃了亲苏、拥共的旗帜，公开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

盛世才刚一变脸，我们这所苏式军校就突然接到通知：全校紧急戒严，关锁大门，任何人员，一律不准离校。

1943年9月，盛世才亲自来到学校（他兼校长），召开大会。他一反常态，大放厥词，公开反苏反共，并宣布两条命令：

第一，学校所有教职员工，从即日起集体加入国民党为国民党党员；

第二，立即停止所使用的苏联教材，改用国民党的政治军事教材，并把学校名称改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黄埔军校新疆第九分校。

一夜之间学校里发生突变，进来了一批国民党军官和部队，赶走了所有的苏联教官和职员，收缴、焚毁所有的苏联教材和进步书籍报刊，禁止校内一切进步活动，并检举和严厉查处异党活动。

学员全部换上国民党的黄军服，举行青天白日旗升旗典礼。

学校取消了过去的一切优厚待遇，并命令延长一年学习时间，对学生进行整肃。

整个学校都笼罩在恐怖的气氛之中，我的内心充满了震惊、愤怒、恐惧和迷惘。我悄悄探问周围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沉默无言。校园宿舍再也听不到昔日抗日的歌声和欢笑声。

这时我已经二十多岁，是应届毕业的青年，虽然一时还不知道内情，也不知道今后的路会怎么走，但在心灵深处，已经深深地埋下了正义的种子。当时，我强忍着胸中的不满，盼望早日离开这个变得令人窒息的牢笼。我暗自下定决心，硬着头皮混过一年，等待毕业离开军校，远走高飞，去寻找新的人生旅途。

1944年4月，我终于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这所才命名的新疆

黄埔第九分校。但它毕竟仍是我的母校，它装载着我太多的欢乐和痛苦，它给我刻下深深的光明与黑暗的记忆。它不但使我获得了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而且使我懂得了很多的革命道理，使我树立起了爱国主义的思想。这就是我现在出任新疆黄埔同学会副会长的一段来历。